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

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历史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成建制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经历了在瞬息之间成为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

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放弃了政治改造运动，清理了过去的极“左”思想和做法，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乃至到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建设目标，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的重大影响，产业的快速壮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而生，社会分化就由此而来，我国社会流动也就摆脱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所以这是一种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

2、正像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示，中国越来越趋于开放。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代际流动率看，改革后比改革前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而从代内流动率上看，向上流动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率增长了4个百分点；9001年与198f年相比，代内向上流动率（从前职到现职）从18.7%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力主义，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相应的业绩回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作为量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而像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携385页）

3、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职业高级化是所有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分析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白领职业拓展方面的变革是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其中英国，早在上世纪初，职业位置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的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1982年的3.1倍和2倍，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

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4、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只经历着社会转型，而不存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其社会流动也只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和规律，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这样的转型。但是，体制转轨是中国改革后发生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社会转型一样，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打上明显的体制转轨烙印：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到现在其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常态性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预而发生变化。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有可能影响一个阶层的地位。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采用新的政策、构建新的体制来促进体制转轨，因此，制定合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对于促进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流动的有序、合理进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与两大转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不论在内涵上还是作用方式上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和多样，表现为制度—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后致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赋性机制和后致性机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重要机制，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先赋性机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先赋性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通过对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机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从后致性机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业绩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忠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后致性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中不曾存在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政治忠诚的作用在减弱，但是，并没有绝对地退出社会流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员资格依然对于获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制中政策、制度这些宏观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6、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在没有摆脱体制转轨痕迹的同时，开始表露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正的消极趋向。在中国社会趋向更加开放、社会等级位序整体提升的同时，另外三种消极的社会流动趋向正在出现，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一种倾向是，阶层流动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强，将会减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降低社会的开放性。另一种倾向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主要资源出现向上层集聚的趋势。还有一种倾向是，一些阻碍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障碍，

如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的配置制度等仍没有被革除，反而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流动。

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政策含义

从中国社会流动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前开放，社会流动加快，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向上的流动机会，体现现代化进程的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此同时，一些消极的流动倾向正在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合理和公平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还很顽强，特别是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相当大。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蕴含着多种可能的变项，如何通过促进社会流动，遏制最坏的变项，争取最好的变项，对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在这里，国家政策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社会流动来看，最理想的发展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阶层流动，从而不断壮大中间阶层，顺利地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我国也就由此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强国得以确立。

但是我们看到，与改革初期不同，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坚阶段，其中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格局，特别是强势利益群体和阶层已经形成，新的改革举措有可能会遇到他们的抵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消解改革政策的作用，而且他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抵制和消解的能力和条件，有许多优势使他们的作为遭遇不到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制衡。他们的抵制和消解无形中会增大决策者的政治压力和风险。这一切都极大地考验着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意志力、社会责任心、认识水平和领导管理国家的能力。因此，从这样的社会惯性、阶层利益关系格局以及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过程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向：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流动的代际传承性在不断提高，中间层发展不起来，大量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非农化，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兼业者。这样的流动趋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长期化：要么会出现“拉美化”，一群人享受着世界上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不能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于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之中，不但缺乏参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在精神道德上有可能受到极大损害，变得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盗窃、妓女、吸毒、抢劫盛行；要么会出现“非洲化”，战乱频发，难民潮起；要么会出现“西西里化”，即黑社会猖獗，政客与黑社会勾结合谋，腐败盛行。当然，这些都是最坏的结局，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无从谈起，甚至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被边缘化乃至瓦解。

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势，那就是：中间阶层

有了一定规模，农业劳动者规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但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无法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态，而是上层小、中间与下层一样大的“蜡烛”形态，到了“蜡烛”形态后，就再也不能向橄榄型演变了。这种形态是最有可能的，现在也是最有条件实现的。这种状态虽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结构形态中，虽然也存在两极分化，但是并不是很严重，大多数人还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虽然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不至于损害社会基本的稳定秩序；国家虽不能很强大，但也是一个强国，在世界上还可以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中国的目标仍然是现代化强国。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最坏的社会流动趋向，改进社会流动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进程中，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目前的“纺锤型”转变为“蜡烛型”，然后再经过50年的努力，实现从“蜡烛型”向“橄榄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构建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我们从对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研究中，已经看到一些合理的、合乎规律的社会流动机制，期待着这些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多的合理机制建立起来，那么，相信一个开放的、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对中国来说将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不久可以触摸得到的可能现实。

同样，中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是从流动机制还是流动条件来看，绝大多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只能向近邻的阶层流动，不可能取得跨阶层、长距离的流动，而且，目前即使是向近邻阶层的流动，也还存在不少障碍。因此，确保农业劳动者和工人从自己阶层向近邻的阶层转移和流动，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实现中等距离的跨阶层流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国家必须在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有非常积极的作为，根据我们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 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显然，加快城市化，是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对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农村发展和繁荣问题呢？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则，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农村人口都会涌入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两极分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

2. 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可能兴

办大型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一般来说，他们或者去当工人，或者去当个体工商户，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特别是贷款上)支持他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并且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向兴办中小企业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

3、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一个覆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教育、技能是现代化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机制。即使这样的后致性机制在我国社会流动起主导作用，但由于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但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不论在其内部还是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

4、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

岗位和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就业，罔论实现向上流动了。因此，国家不论在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还是在科技创新上，都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

如果我们的社会流动研究能够为国家和每个人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自然会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个开放、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一定会实现。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